

而中国人脏乱差的心病积压多年,以至于一旦经济繁荣了,就大洗狂洗起来。当今很多城市居民,每天多次洗澡,又费水又费皮,不染上洁癖不罢休。

## 清洁高雅轮流转

很多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在卫生方面自古就落后于西方,动不动就拿西方的例子来侮辱中国。这种印象一是来自西方的影视作品——干净的城市,整洁的男女,二是来自中国的令人遗憾的现实——污浊的城市,邋遢的男女。但其实摆脱这种错位比较,整体上看,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西方要洁净和讲究。

西方古代,洗澡是比较稀罕的事情。古希腊的沐浴,不是为了清洁身体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只有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公共浴室比较发达,但是却成为淫乱的场所,罗马最后毁灭于自己的腐败。一洗澡就淫乱,可见平时没有养成以平常心来看待洗澡的习惯。而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清洁身体不同部位的专有词汇:沐、浴、洗、澡等,跟洗浴有关的情节频繁出现在史书和神话故事中。“沐浴更衣”早就成了日常词汇。

外交官就是文装军人,是用笔和舌打仗的。有时候,外交官要根据“战场”的不同情况,使用各种“秘密武器”来对付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不甘心受制于列强,向希腊发动进攻,一举将希腊击败。此举激起了英国的不满,英国遂联合法、意、美、俄等国派兵在瑞士的洛桑与土耳其谈判,企图迫使土耳其签订有关条约。

## 装聋

英国派出的外交大臣是克遵,其人最大的特点是声音洪亮;土耳其派出的代表是伊斯美,其人则有点耳聋。会谈开始后,克遵威胁的言辞像连珠炮一样向伊斯美压来,大有泰山压顶之势。等到克遵声色俱厉地叫嚷完了,各国代表都面对伊斯美看他做何表示时,他不

而中国很早就根据各地的条件和风俗,普及了马桶和蹲坑式厕所。至于贵族的如厕方式,看看《世说新语》,就足可想见了。

西方在受尽了肮脏之苦,病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后,乃觉得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借助工业革命和侵略扩张抢去的黄金白银,开始普及现代卫生系统。1899年,波斯特尔发明了直落式坐便器。大量盥洗架的制造,使欧美人民习惯了每天洗脸——这项移风易俗之举,已经被勇士呼吁了数百年。1916年后,由于陶瓷工业的突破,现代式样的浴盆开始大量生产,欧美人有了闲钱,有了闲工夫,有了闲欲望,终于感觉到洗澡之乐,于是后来居上,变成了“干净人”。

英国最早提到刷牙是在1651年,中国的清朝初年。伊丽莎白女王年轻时牙是黄的,晚年是黑的,比林黛玉和贾母她们落后多了。欧

慌不忙地张开右手靠在耳边,并将身子向克遵移动了一下,态度温和地问:“您刚才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克遵气得浑身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时在以后的谈判中,伊斯美不时装聋作哑,对土耳其有利的话他都能听见,不利的话他假装听不见。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英、法等国无功而返。

摘自《旧闻》

## 史树青：一生为国“捡漏”

鉴藏年少独名家

北京和平门外,全长约800米的琉璃厂曾是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上世纪初,年幼的史树青随父亲来到北京,此后,喜好书画的父亲就常常带着他逛琉璃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少年史树青逐渐走进了文物古玩的门槛并慢慢熬炼着自己的眼力。在这种熏陶中,史树青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知识的不足,恰好,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开始公开授课,学院邀请当时著名学者讲授课,史树青成为当中最年轻的学生。放学后他还是经常去逛琉璃厂并把捡漏儿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鸿来、孙照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

有一次,张鸿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帮着鉴定一下。但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犹疑中,张先生找来了史树青。年少的史树青接过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說:“真的。”“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不少啊。”“能确定。您看这画中的画笔、书法运用得流畅而无滞碍,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我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我有经验。您看这年代也对得上。”先生们见他说得这样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下去,但鉴定书到底任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还是建议买主拿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从此,史树青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

“几士居”里的鉴宝专家  
1952年,史树青捡到了一个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儿。一个熟人为了贴

补家用,要卖些旧书画,一幅成吉思汗的半身画像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在史树青的记忆中,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还是明朝人仿制的;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虽然他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不是元朝的画作,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

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应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

这幅画像的发掘,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纪录,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

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无锈迹,震惊考古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并且被专家称为“天下第一剑”。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

尽管前辈予以了肯定,但史树青自己却总是觉得读书不够,他的书斋取名为“几士居”,意思是:大约能算个读书人吧。年过八旬的他觉得最大的憾事是“此生读书少,垂垂老矣,愧对师长”。

生性率真作假假

还专门劝小贩,把宋砚卖给博物馆。几十年来他通过这种方式为博物馆搜罗到的宝贝不计其数。

史先生生性谦和,待人宽厚,几十年来鲜有与人角,只除了一件事——作假。他的妻子夏老师回忆说:“史先生对于假货深恶痛绝,只要看见就必须交还。有时候电视里播放一些涉及文物的案件,不管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史先生必仔仔细细看。不过他关注的不是什么情节,而是古玩真假,发现是假的,他就会指着电视大叫‘那是个假的,那是个假的。’有时甚至还要和电视吵架。”从这种孩子气的举动里,史老不容虚假的个性可见一斑。

有一次,一名香港富商请史先生鉴定一字字画,尽管每一张字画都很完美,但经验丰富的史先生还是看出了破绽。对于这样的结果,香港人并不满意,他找到史先生的夫人,表示这批字画已经找好了买家,价格也都已谈妥。只要史先生肯为字画题跋,证实东西是真的,他愿意将所得的1/3或者一半分与史先生。

一直陪伴史先生,见证了鉴定全过程的夏老师回绝称:“您的藏品确实是真假参半,如果您是买定出假货,是他的眼力不够;如果他故意把假的说成是真的,那么是作伪证。无论是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还是一个做了几十年鉴定的读书人,这种事一次都不能做。”事后史先生对夏老师说:“你说的就是我要说的。”

无论是在嘉士德的拍卖预展上,还是在天津的旧货市场里,只要看见假货,史先生总要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种率直,他被请上了拍卖会,也曾被旧货摊主叫骂,更有人深夜打

来电话,威胁他管住自己的舌头,而史先生依然故我。

2005年4月初的一天,史树青来到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前,他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辨认出剑身两行八个文字,史树青暗吃一惊——这八个字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而且是错金的。“有价值!”心中有数的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了回来。然后,他将这把剑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不料过了几天,博物馆将剑退给了史树青,理由是:专家认为这是假的。一生痛恨作假的史树青居然献了一把假货,学界开始躁动起来,加上媒体的助阵,一时间各种观点和质疑在史先生的头上。

被史家收藏的这把越王勾践剑,剑柄处饰有12圈同心圆,剑镡两面分别嵌有青金石和绿松石,剑身一面遍布菱形暗纹,一面篆有“越王自作用剑”八个鸟形文。打开郭沫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画册,从样式到造型,眼前的这把剑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那把“天下第一剑”一般无二。对于这把剑的归属,夏老师表示,还是要等学术界有一个明确结论后再定,否则,这也是对故去的史先生的不敬。

摘自《大众文摘》

晚清名士梁启超来到江夏(今武昌)讲学,按规矩礼节性地拜访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谈话之中,张之洞出了一副对联,请梁启超对下联。张之洞的上联是:“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张之洞这上联的意思是说,在江淮河汉四水里,长江名列第一;在春夏秋冬四季中,夏天排在第二;我在江夏坐镇,你来江夏讲学,“谁是第一,谁是第

二”呢?要与一位地方军政长官争第一,比高下,看你一介书生哪来这个胆量!你不敢,自然就屈居“第二”,甘拜下风了。

梁启超的下联是:“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前?”这下联的意思:“三教”指儒、释、道,儒家排名在前;“三才”指天、地、人,

如今不少德国人向往失业。尼诺女士就是认识的一位向往失业并已实现这一愿望的德国人。她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钟雯”。这是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汉语时用的名字。这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妈妈,1994年离婚后一直在波恩的一家三星级旅馆工作。前不久,却突然提出辞职,理由是不适应那份工作。

“其实,我是在找借口失业。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她说,“我上班时,每月工资2000马克,比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还少800马克,这工资中还要上缴70马克的税费,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的一半。而我失业之后,虽然没有工资,但每月领到相当于原工资总额67%的失业补助金。同时,还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既自由,又可创收。”

她所说的“自己喜欢的事”,其实就是做中国人的导游。她辞去旅馆工作不久,经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位校友牵线,在中资企业某旅游公司专为来欧洲的中国公务考察团做向导服务。这种雇佣关系虽然是松散式的,但每陪一个团的收入却是不菲。除旅游公司按天支付工资外,考察团还得视团员多少按当地规矩为其支付小费,小费按天支付,每天30至100美元不等。除此之外,如果她所服务的考察团的团员在旅游商场

处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

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声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口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说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在旧社会,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家人一定姓张。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

但是容忍并不容易。1935年,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的车经苏联赴德国,车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四小时,由苏联海关检查行李。这是无厚非的,入境必须检查,这是世界公例。但是,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我们这一帮人想到另一个资本主义

## 难分第一

人居于后;我是个读书人,怎么敢在你之前?但是“三教儒在前”,我又“岂敢在后”呢?对联对了,话回了,柔中带刚,不卑不亢,维护了读书人应有的尊严。

南齐王僧虔,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四世族孙,也练就一手好书法。有一日,齐太祖萧道成提出要与王僧虔比试书技。于

## 德国人向往失业

买了东西,她还可得商场付给的数目不小的一笔回扣。这一系列的进账都不需上税。因为是松散式用工,没有履行用工登记手续,所以她的失业补助金仍照领不误。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没有人不认为失业是一种不幸。而在德国,工薪阶层的人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失业是福。”尼诺女士说,这并不是就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和税务政策的“引导”。上班拿工资的人以各种名目的税、费为社会做贡献,尤其是东西德统一以后,不仅税赋更高,而且,每月还要从每个人工资中扣除2%作为扶持东德地区的专项基金。现在的税费总额几乎占每月工资的1/3。而不工作的人却可以靠福利过得很滋润,有的人拿着丰厚的各类救济金旅游度假,甚至周游世界;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凭着上大学免费的政策,竟十年八年地在大学里进行“再教育”。

钟雯说,她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至今还在海德堡大学读书,而她在北京上完大学都工作好几年了。钟雯抱怨说:“这样的社会分配机制,谁还愿意为生存而上班,谁又有必要为生存

个限度。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如果外国人污辱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揣摩形势,要容忍,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污辱我们的国家,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命,这就是我们容忍的界限。幸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在这里摆弄笔墨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在公共汽车上,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连忙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有不少人能“对不起”都不会说了。于是就相视相骂,甚至于扭打,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愿:容忍兮,归来!

摘自《重庆晚报》

## 以容忍为荣

国家去,恐怕没有好人,必须严查,以防万一。检查其他行李,我绝无意见。但是,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盒,却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这里敲敲,那里敲敲,薄薄的一层铁皮绝藏不下一颗炸弹,然而他却敲打不止,我真有点无法容忍,想要发火。我身旁有一位年长的老外,是与我们同车的,看到我的神态,在我身旁悄悄地说:“容忍是很大的美德。”我对他微笑,表示致歉,立即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看来容忍确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美德。但是,我认为,也必须有一

是君臣二人各写楷书一幅。写好后,齐太祖要王僧虔评谁写得更好。

如果直截了当地说真话,是会冒犯皇上的;但是,如果对皇上说假话,也犯了“欺君上罪”。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僧虔是这样回皇上的:“臣的书法,人臣中第一;陛下的书法,皇帝中第一。”不仅书法,王僧虔的智慧也是第一流的!

摘自《中外文摘》

而上班呢?”

钟雯有位邻居叫莱米多,结婚十多年都没要孩子,怕养孩子麻烦。但没孩子就不能得到相关的福利,靠夫妇二人的工资,总觉得入不敷出。几年前,他们向政府当局申请,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由此每月获得的福利金比一个孩子的税后工资还多。为了获得更多的福利收入,夫妻二人又出演了一桩离婚案。在法官面前,夫妇唱随,一致强调非离不可。在财产分割方面,莱米多“发扬风格”,主动提出房产全部归女方。法官见二人都死心塌地要离婚,而财产方面双方又达成一致,只好照此判决。离婚后,夫妻生活却依然如旧。办离婚手续后的第二个月,莱米多如愿以偿地分到一套“社会房”(救济房)。他按事先的计划,将这套房私下转租出去,每月收房租近2000欧元,这笔收入相当于他们夫妻二人税后工资的总额。

本来,德国的许多福利项目都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救济金是帮助那些“靠自己的收入和财产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人”,失业补助金是帮助那些“在过去三年内至少工作过十二个月,并且一直在找工作的失业者”。但是,政府显然已搞不清哪些人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哪些失业者一直在找工作或已找到了工作。

摘自《中国社会报》

摘自《中国留学生相约:如果外国人污辱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揣摩形势,要容忍,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污辱我们的国家,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命,这就是我们容忍的界限。幸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在这里摆弄笔墨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在公共汽车上,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连忙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有不少人能“对不起”都不会说了。于是就相视相骂,甚至于扭打,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愿:容忍兮,归来!

摘自《重庆晚报》

## 名流故事

### 胡适眼中的勋章

卡毓方

胡适一生获得过35个名誉博士学位,但是他说,他的这些名誉博士加起来,也比不上罗尔纲一本薄薄《师门五年记》带给他的光荣。

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回忆记》。缘起:1930年初夏,罗尔纲即将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想找一处地方研究历史,他给校长胡适写信,请求帮助。胡适斟酌再三,答复说:“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少。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

自此良机,罗尔纲自是欢喜不迭。就这样,他进了胡适在上海的家门。半年后,又随胡适迁居北平,并在胡适的安排下,进北大研究院考古室工作。胡适名满天下,然而世人眼中的胡适,大抵是舞台人物的造型,或多或少,都带有表演、作秀的味道。罗尔纲不然,他对胡适的观察了解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细微的,坦白的,全然不加粉饰的,这就和一般习见的传记大相径庭,大异其趣。试举一例:罗尔纲出身贫寒,入师门,担任抄写员,面对胡府川流不息的名士,不免产生自卑。胡适善解人意,据罗尔纲记述:“每当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卑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买了一本《安徒生自传》,想研究一下人家是如何到那都能保持一颗童真的心灵的。没想到在前100页,读到却是一个农村孩子的成功捷径。

一、坚决远离自己不喜欢的生话。这个穷鞋匠的儿子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应该跟工厂里那些喜欢讲下流话的人属于一类,尽管他和他们一样穷,他的做法是逃离工厂,靠母亲养活。当然,他很幸运,获得了母亲的保护。

二、从不重视别人的讥讽和嘲笑。从小到大,安徒

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稍停,胡适又说:“我现在为你着想,还是留北大好,两处都不要去。你到别的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如此推心置腹,如此细致入微。听了胡适的解释,罗尔纲彻底明白了恩师的良苦用心。

胡适少年得志,名满天下,他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就是证明。但“名”这玩意,有用,也有限。举个例子,20世纪40年代,胡适担任美国政府驻美大使,其间送上门来的博士头衔,就有27个之多。而同是这个胡适,同是生活在美利坚,1949年后,只因他的身份大使沦为难民,那么多的博士证书也没能为他换来一个教席,最后只能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谋一个中文部的管理员。胡适经此沧桑炎凉,愈加珍重昔日学生罗尔纲授予他的这枚特殊“勋章”——也就是《师门五年记》带给他的温暖。罗尔纲此书写于1943年,仅三万字,因为种种变故,始终未能正式出版。1958年12月,胡适六十八岁生日前夕,他决计自掏腰包把它印刷出来,作为生日礼品,赠给前来贺寿的每一位客人。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天,1962年2月24日,胡适宴请“中研院”院士时,也送了每位客人一本。那天,宴席刚散,胡适站在大堂送客,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呜呼,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遂成了胡适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馈赠。

摘自《今晚报》

剧院伴唱的差事。并在不久后获得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全额高等教育资助。

本来注定要进工厂做学徒的穷孩子,就这样一步步向上等人迈进。

是的,对我和我的朋友来说,这种耻辱感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比成功的荣耀感所带来的欢乐更大。所以我们至今仍任在研究安徒生当时的心理状态,而安徒生早已走进了历史的圣殿,就连无意中资助过安徒生的那些人也已经过回忆录了。

摘自《西安晚报》

## 你敢学习安徒生吗

生一直是别人的笑料。他朗读书诗时候被邻居笑话,他写诗的时候被同学笑话,他把当地的一篇神话改编成《海的女儿》时,又被同行和媒体笑话。很显然,安徒生注意到了这些不太善意的反馈。尽管他也痛苦过,但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三、主动接近名利巅峰的大人物。这一条简直就是安徒生的杀手锏,那绝不是一般人想得到做得

出。当他在报纸上得到某位大人物的行踪时,他会冲上去,把自己介绍给对方,并准确地表达这样的意思:我现在的情况很窘迫,我很希望得到您的援助。用这种方法,他敲开过当时丹麦歌皇后的门,敲开过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主任以及皇家歌剧院院长的门。就这样如法炮制,在被拒绝过N次之后,他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在皇家歌

摘自《今晚报》

剧院伴唱的差事。并在不久后获得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全额高等教育资助。

本来注定要进工厂做学徒的穷孩子,就这样一步步向上等人迈进。

是的,对我和我的朋友来说,这种耻辱感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比成功的荣耀感所带来的欢乐更大。所以我们至今仍任在研究安徒生当时的心理状态,而安徒生早已走进了历史的圣殿,就连无意中资助过安徒生的那些人也已经过回忆录了。

摘自《西安晚报》